清代的“基金生息”述论

张 建 民

“基金生息”，指筹拨一定数目的资金作为基金，通过相应的经营方式获取利息而为特定支出项目筹措经费。这种经费筹措方法在清代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基金生息”的内容相当丰富，基金来源复杂，营运生息的方式多种多样，利息的用途更是形形色色。它几乎贯穿于整个清代，不仅对清代的财政、对当时的社会、经济诸方面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基金生息”在清代的运用

政府大量运用“基金生息”形式筹措各种经费，在明代以前的史籍中并不多见，迨至清雍正朝始多见于档案记载。此后，屡经行之有效，很快渗透到财政关系的各方面。以利息的用途或筹拨生息基金的目的加以区分，约可分为以下诸类。

其一，赏恤宗室觉罗及八旗官兵。道光十四年(1834)一次即拨部库闲款10万两交长芦盐商营运，生息所得为赏恤八旗宗室觉罗之用^①。据《清穆宗实录》卷81记载，两淮等盐区商人亦承领有同样用途的基金。另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载：雍正元年(1723)奉旨发内库银90万两生息，所得利银赏给八旗并内府三旗官兵兵丁，以济其婚丧之用。此类基金的拨发次数很多，满洲、蒙古、汉军八旗皆有设置^②。

各省地方也有相应数额的惠兵生息基金。据雍正十年三月的上谕云：“各直省督、抚、提、镇标下之兵丁，朕俱赏给生息银两，以济其缓急之用。”^③各省数额不等，有多至十数万两者，每标多在1—3万两之间^④。

其二，筹措河防水利经费。为河防、水利工程筹措资金而设的生息基金，项目不少，数额亦颇可观，应为研究清代生息基金时不可忽视的问题。

《清盐法志》载道光四年直隶总督蒋攸钰等人奏折中有“(长)芦(盐)商前借水利帑本银150万两，经户部议准减本停利，于本年交本银20万两，酌留50万两照旧生息，其余80万两分作8年提缴，应交息银仍令计本完纳”等语；道光八年四月王鼎奏折中有“直隶水利生息帑本80万两”、“豫省(河工)料价帑本银四十万两”诸项^⑤，可知长芦一区盐商承领的水利经费生息基金已相当可观。长芦盐区之外，两淮盐区和山东盐区的盐商亦承领有相应数目的河工生息基金，据光绪元年曾国荃奏请饬催欠解生息银两奏折所云，截至光绪元年(1875)六月底，应该解往河南的河工生息银两中，两淮盐区欠解银181万两；长芦盐区欠解银95.7万两；山东盐区欠解银31万余两^⑥。针对此折的上谕中有“两淮各商，领帑最多，欠款更巨”一语，因此，两淮盐区的河工生息基金多于长芦当是可以肯定的。在两广盐区，亦先后有乾隆元年和十四年所发的修筑围基、堤岸等水利生息基金9万余两，截至乾隆二十四年三月底共获利银433737两^⑦。

盐商之外，将生息基金发交其它商人，为水利工程筹措经费的事例亦很普遍。在湖广，乾隆八年至四十五年间，先后拨发官银近十二万两，交湖北各府州县商人营运，利息为武昌江岸、汉江沙洋堤防、江夏、汉阳江堤、金沙洲江堤、钟祥汉江堤防等工程岁修经费。道光

十八年，又拨出官钱局钱10万串为长江堤防工程的生息基金^⑧。在安徽，乾隆三十六年，拨款2.7万两发商生息，每年得利银3200余两，作为安庆西门外漳葭港岁需挑浚经费；乾隆五十三年，又批准安徽动拨藩库所贮社仓谷价银10万两，发交通省典商生息，为筹备全省水利工程经费^⑨。其它如江西^⑩、四川^⑪、陕西^⑫、河南^⑬等省也有水利经费生息基金的设置。官款之外亦有民间筹集基金，发商营运，生息为水利工程经费的。

其三、筹措军备经费。拨发基金生息而筹集军备资金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有修理军械、修建军事设施、缉捕缉私、练兵等费用以及军饷诸项目。嘉庆朝(1796—1820)以前所见较少。据《两广盐法志》记载，乾隆十二年和二十二年，曾先后两次发银共8000两交两广盐商营运，以利息为龙门协添补兵米之用^⑭。乾隆六十年，经闽浙总督长麟奏准，拨发藩库银20万两发盐，当各商营运生息，为清军水师各营出海剿捕“洋匪”筹措经费^⑮。这是前期军费基金数额较大的一次。嘉庆十九年，筹拨基金钱5万串，发交长芦盐商营运，以利息为直隶提督教练步甲技勇公费^⑯。嘉庆二十二年和二十三年，又先后两次拨发基金银5万两交长芦盐商营运，以利息为新设之天津水师营兵饷^⑰。道光一朝，军费生息基金拨发次数颇多，数额可观。道光二年，为筹措云南备边练兵经费，发银10万两为基金生息；次年，为筹措广西缉捕“盗匪”经费，发基金银15万两生息；七年，为广东沿海缉捕造船经费发银10万两作为生息基金；九年，发修制军械生息基金4万两；十二年，又为广西缉捕经费拨发生息基金10万两；十三年，筹拨基金银4700余两，发商生息为山东兖州、登州、曹州三镇标营修造军械之用；十七年，拨发基金银6万两，交长芦盐商生息，为直隶地区缉私巡兵经费；十八年，第三次为广西缉捕经费筹拨基金生息，银本为10万两；十九年，拨发基金3.5万两，生息为广东沿海炮台、排练诸设施岁修经费；二十七年，为筹四川缉捕经费，发银10万两给省属盐茶商营运生息^⑱。据《清史稿·宝兴传》载，道光中，四川为筹备防务，增设练勇，曾经拨官帑100万两，其中的37万两亦是发交盐茶各商营运生息，每年息银即可得3.7万两^⑲。这种现象的产生绝非偶然，它与清代的财政、社会、政治诸状况的变化密切相关。

其四，补贴某些特殊修造项目。乾隆五十三年，拨发基金银6万两，交两淮盐商营运生息为漕船修理等费用^⑳。嘉庆二十一年，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先后拨发基金钱15万串交长芦盐商营运，生息以补二局铸钱料价之不敷^㉑。嘉庆二十四年，拨借大制钱7万串发商生息，以为修理八旗官房之用^㉒。道光五年，拨发基金银6万两交福建盐商生息，“以备奉文修造钦工经费”^㉓。此类基金生息中，所见较大的一笔是嘉庆十六年，“经直隶总督、长芦盐政奏明，借拨山东征收盐斤加价银40万两，交东商具领生息”，为直隶添造剥船筹措资金^㉔。

其五，筹措社会救助资金。所谓社会救助资金，包括育婴堂、普济堂经费，鳏寡孤独之赡养以及贫民救济、救灾等项目。今见较早通过基金生息途径筹集经费的是京城广渠门内育婴堂。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载，雍正二年，赐广渠门内育婴堂帑银1000两；八年又赐帑银1500两，“令置立产业，每年约收租银600余两”^㉕。其后，陆续有一些省府州县的育婴堂、普济堂建立了生息基金，数额比较大的有：乾隆六年，动拨司库商捐银3万两为湖北汉阳县育婴堂生息基金^㉖。乾隆三十五年，江西省拨发司库仓谷粟买盈余银4万两发商营运，生息为各府州县普济堂经费^㉗。嘉庆十三年，奉旨将顺天府没收入官之私抽牙用钱2500千交大兴、宛平二县生息，作为府属普济、育婴二堂经费^㉘。其它如湖北省城、浙江省城、福建省城、广东省城、江西省城等地的育婴堂或普济堂都有明确记载是以基金生息为经费来源。各州县则“因地制宜，亦有捐资生息、置产收租，设局收养者”^㉙。长芦、两广等盐区商人都承领有数目不等的育婴堂生息基金^㉚。

其其它方面的事例如：嘉庆四年二月乌鲁木齐都统崑麟奏准，拨库贮银2万两发商营运，生息以为赡养鳏寡孤独之资^②。嘉庆十二年奏准，拨银3万两给长芦盐商营运，生息为赏恤京城贫民棉袄(2570件)经费^③。光绪十七年提拨赈捐余款40万两发商营运，生息以备赈灾急需^④等等。

其六，筹措文教、宗教诸项经费。这类基金在整个清代的基金生息体系中正如乾隆皇帝所说“乃其节目之小者”，主要为一些大书院、义学以及寺庙拨发，还有一部分为旗籍举人赴京会试提供经费。如江苏紫阳书院基金4万两；福建鳌峰书院基金7000两；直隶莲池书院基金2万两；仁寿寺香灯基金8万两等等。

其七，津贴苦缺苦差及其它杂项公务费。

清代基金生息之运用甚广且杂，实难一一确切归类，除上述几大方面外，还有很多生息项目，诸如皇帝出巡所需部分费用、某些衙门庭园的差务费用以及对少数苦缺苦差的津贴等等，其数额有时相当可观，如乾隆三十年为巡幸属车经费而拨发基金10万两；道光二十一年为津贴河南淇县等15州县苦差而拨的生息基金20万两等等^⑤。

以上所举，已足见基金生息在清代运用之广泛、数额之可观。那么，这些供营运生息的基金从何处来？大致言之，基金来源有三：一是内务府拨发资金；一是户、工诸部拨发资金；一是地方财政资金。

内务府资金。内务府是清代总掌皇室财政的机构，同时管理皇室、宫廷其它生活事务。从雍正朝起，内务府开始大笔拨发、外借生息基金，如前文已提及。据《内务府奏销档案》记载，仅乾隆二十二年截算的拨发基金银两即达195.3万两之多^⑥。一般情况下内务府发放的基金，其利息是为内务府支出服务的，当然也有个别情况例外。内务府之外，管理皇族事务的宗人府亦拥有大笔的生息基金，但是，宗人府经费乃多通过户部发放、收息。

户、工二部资金。户部虽然为国家财政的总理机关，直接发放的生息基金则不多见，有的记载甚是含糊，或者并不言及基金来源，故难以判定归属。另外，清代实行中央集权下的一级制财政制度，全国财政收支皆统一在一个大系统中，中央与地方收支系统一元化，使得国家财政系统中的地方财政包括在中央财政之内。因此，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本来即难以区分清白。地方没有财政自主权，有些款项虽存留藩库、道库，但支配权在户部；同样，有些款项虽由藩、道等库支拨出来，亦不能算作地方财政拨款。记载比较明确的项目如乾隆三年，为广东潮州等地筹措堤防水利经费、拨放关税银10万两为基金，交广东盐商、洋商营运生息^⑦。嘉庆十四年，为福建水师出洋巡捕筹措经费，又拨放关税银10万两，发交福建盐商营运生息^⑧。嘉庆二十一年，为了抵补户部宝泉局铸钱料价不敷之差额，户部拨基金10万串交长芦盐商营运生息。同时，工部亦发放了补贴宝源局资金的基金钱5万串^⑨。道光十四年，长芦盐商承领有“续发宗人府帑本银”10万两，目的是为赏恤八旗宗室觉罗。这笔基金动拨的是“部库闲款”^⑩。

布政司、道等地方资金。各地方拨发的生息基金次数众多，名目繁杂。基金来源亦很复杂。有布政司库闲款(山西、山东)、入官资产(河南)、江工、城工节省银(湖北、安徽)、盐茶公存银(四川)、盐规银(江西)、饷摊军需银(河南)、平糶谷价赢余银、社谷息银(湖北、江西、安徽、四川)、盐斤加价银(山东)、司库备贮银(湖南)、司库商捐银(湖北)、藩库节省银(直隶)、运库、道库积存银(直隶、浙江)、司库贮存空缺养廉银(广西)、藩库赏借息银(广东)、文职养廉扣旷积存银(广西)等等^⑪。很明显，款项虽多，正项很少。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种官府基金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两种资金来源，这就是绅商捐纳基金和有关民户摊征基金。前者如乾隆年间，两淮盐商为内务府赏费用而公捐生息基金60万两；嘉庆年间，湖北蒲圻县绅张兆安为本县岁修堤防经费捐置基金10000两；咸丰年间，郑亲

王端华为钦天监公务费用捐置生息基金10000两等等^④。

至于摊征集资方式则多见于地方性水利事业中，如湖北江夏县长江堤防岁修经费生息基金12000两、江西省南昌县朱坊圩水利工程岁修经费、星子县蓼花池岁修经费生息基金1400两、湖北嘉鱼县长江堤防岁修经费生息基金10000串、汉阳县护城堤防岁修经费生息基金7000两以及天门县万福闸工程岁修经费生息基金等等，皆为“受益业户”按受益大小均平摊征的，这些基金先后建立于乾隆、嘉庆、同治、光绪诸朝^⑤。不难看出，除了少数项目，捐输或民间集贸的生息基金的数额都比较小，因此大多适用于一些小规模的支出项目。

综合各地、各种性质的基金营运情况，生息的方式无外乎领承基金自己经营和将基金交商营运两种，只是各种方式中又可区分为数条不同途径。有领款后置买田地收取租息者；有以基金开设官当、官店的；有将基金交与当地典当商营运生息的；有交与盐商、茶商营运生息的。对此，韦庆远先生在研究雍正朝各地将军衙门、督、抚、提、镇各标“生息银两”的营运时已有过详细论述^⑥，可供参考。至于各种生息基金的利率则都远较一般典当、借贷为低，大约局限在1分至1分5厘之间，达到2分利的为极少数。

考察各地盐商营运的生息银两，我们发现，以某种指定经费的基金形式存在的生息银两之外，还有一种以支持盐商名义贷出的巨额官帑。如两淮盐区，乾隆三十六年，赏给盐商江广达银30万两，月息1分；乾隆五十年，赏借银40万两给盐商江亢达、江正大俾资营运，月息1分，解交内务府^⑦。再如福建盐区，乾隆四十三年，为接济盐商发“晒帑生息本银”13万两，月息1分；嘉庆二十四年，再发“晒帑本银”20万两；道光二年，又发“养灶帑本银”11万两^⑧。在两广盐区，道光十年，批准运商李念德之请求，赏借库存盐本银12万两，十五年内连本带利交还银24万两^⑨。这部分“济商官帑”乃有目的扶持盐商的贷款，一般是在盐商困难、需要资金之时拨放或请贷，官府虽然收取利息，但济商是第一位的，取利在次。“生息基金”则不然，它是作为某单位的一种取利途径而交给盐商营运的，基金的第一位目的是取利，它不管盐商是否需要资金，有摊领的嫌疑。所谓“领帑则按股均分，交息则依期完纳”^⑩，不无此意。至于济商之贷款也许终成累商之负担，或者生息之基金间有助商之效益则属意外结果。

在生息基金的经营过程中，尚有两点不可忽视。第一，各地各单位基金生息的经营因时因地制宜、灵活机动。这在各地督、抚、将军的有关报告中常能见到，如川陕总督查郎阿奏请因地制宜，将地处极边、营运维艰的延绥等地商人领营的基金利息减轻，比一般地区降低五厘^⑪；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嵩阿礼、盛京将军清保等奏请因时制宜，在“滋生银于给赏外尚有赢余”的情况下，将盛京等地的生息基金原定利率适当降低^⑫；署凉州将军黑色则根据当地情况及息银需求量奏请将营运生息基金、自行贸易的米、布、煤等铺，“通融量加利息”^⑬。所有这些奏请，都得到了批准。第二，本利相加，以利作本情况的大量存在。早在雍正年间这种情况已经出现。较早的有广东提督王绍绪在雍正八年十月二十一日的奏折中就讲到“月收月赏约有剩余，亦陆续发给典铺作本”^⑭之事；雍正十年，广东将督抚提镇各标先后所得之生息基金银10万两及历年所积余存息银3万两一并归两广盐运司衙门借给商人营运生息^⑮。上下两江各标营之生息基金亦是“存有余息，复行作本，源源接济”^⑯。甚至有不少项目，“息银倍于原本”，从而将本银撤回，纯以息银作本，继续营运生息。如两广盐商承领的围基水利经费生息基金、天津驻防之生息基金等项目^⑰。这种本上加本、利上加利的做法，曾受到时人指责。然而，这正是清政府所需要的，故倍受赞赏。

“基金生息”与清代财政经济

“基金生息”方式虽然在清代运用广泛，历时长久，却一直未曾确立为一种制度。不仅某些官员不赞成这种方法，最高统治者皇帝亦从未明确表示过“基金生息”理所当然或使其制度化。相反，乾隆、嘉庆、道光祖孙三代都对“生息”一事表示过程度不同的否定态度，特别在乾隆朝，皇帝谕示中多次提到“营运生息之名，本非政体所应有”，“各省存公款项交典商生息，名色本不应有”。他认为，各省借此途径赏恤兵丁乃权宜之计，“徒以事属久行，欲罢不能，非朕本意”^⑤。而且，乾隆朝曾经有过对某些生息基金的清查、限制、收撤之举。据《清实录》、《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八旗恩赏银、各省赏兵生息银先后议停；乾隆三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中亦有“各省生息银两，系钦奉上谕通行停止”之说^⑥。因此，尽管“基金生息”不曾禁绝，却一直处于一种“权宜”、“临时应急”的状态，官方每一笔生息基金的设立，基本上皆需专门奏请，得到最高统治者允准后方能成立，生息的基金亦多临时凑拨名目繁杂各项而来。如前已述，生息的目的更是多种多样，几乎涉及军政系统各种性质的经费支出之中，经营五花八门，没有什么统一性可言。同样性质的“基金生息”项目，可因时、空、奏请人的不同而得到允准或被否决。

清政府为什么未将“基金生息”制度化？关键在于清统治者在观念上尚未放弃官府不应行贸易商贾之事的思想，放债取利之名，他们更不乐意担当。乾隆及嘉庆、道光各帝言论之中，充满着对典当、放债诸事的不屑之意^⑦。同时，官帑发商生息，往往产生官商勾结作弊的不良后果，所谓“官商结纳”是也。时人对“基金生息”的指责，亦大多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因此，清统治者宁愿有其实，勿欲存其名。乾隆三十三、四年间曾有收撤各省生息银两之举，但有不少盐区商人营运之官帑，只要“将旧称更改，定为赏借款项，不得仍存‘生息’字样”便可“并行不悖”，照例完纳利息^⑧。当然，不能说这期间官帑没有发生变化，只是以此证明清统治者对这官府放债取利之名是看得极重的。

为什么没有制度化且被清政府多次议停、收撤的“基金生息”方式却历久不衰，一直延续至清末？归根结底是清政府的财政问题，统治者想干某些事情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又苦于财力不足、经费无着，重要的“基金生息”项目往往在这种情况下设立。因此，“基金生息”之运用与清代财政始终紧密相关。雍正朝，国库不盈，赏恤八旗、兵丁的生息基金尚难筹措，要“俟军务告竣，国用充裕”才能“周遍加恩”^⑨。迨至乾隆朝，大清国力达鼎盛时期，拨发生息基金的能力远胜以前，交商营运生息之官帑基金数目及运用范围因之大大扩张，至乾隆末年，仅长芦盐区商人领借之帑项、基金已达770多万两^⑩。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如此，乾隆朝为什么又有收撤生息基金之举？我们认为，二者并不矛盾，乾隆朝部分地收撤生息基金，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决不可无视财力充裕这一因素，正是国家财力富足，有款供支，才为统治者收撤部分“基金生息”项目提供了条件，嘉庆以降，清朝天下多事，以军事费用为主的财政支出猛增，国家财力则江河日下，迨至道光、咸丰、清财政更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不动款而用足”^⑪的“基金生息”方式是不会被清统治者舍弃不用的。道光朝，一笔笔以筹措军费为目的的生息基金之投放便是明证。因此，完全撇开财政状况考察“基金生息”的运用显然是不尽妥当的。当然，仅有政府的需要尚不足以成全“基金生息”，如果没有相应的基金承领营运环节，不存在适当的生息的社会经济条件，基金再多也无法生出息来。

考察“基金生息”在清代的运用，还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其它方面有关当时社会经济变化的

信息，诸如物价、人口等问题，生息基金中都有反映。前者如嘉庆年间的户部宝源局、工部宝泉局料价津贴基金，道光年间两广军营器械修造人工物料津贴基金以及都江堰工程、江夏长江堤防等水利经费生息基金的筹拨，都反映着当时物价上涨的问题^②。人口增加则集中反映在各地为满、蒙、汉八旗所设的“无米养育兵”、“闲散旗丁”^③等生息基金中。

“基金生息”的广泛运用，对于清政府的财政来说实可谓一举三得。其一，使上下左右的闲置资金由“死”变“活”，投入到流通过程之中，而且在不耗损原额的前提下源源不断地生出数量可观的利息。其二，为清政府弥补了众多的财政支出漏洞，事实上等于获得了等量的财政收入。通过“基金生息”途径弥补的支出项目不可谓不广，除了众多的零、杂项目——如社会福利、救济、文化、宗教经费之外，也有不少正项开支是靠生息解决的，如军事费用。通常而论，军费应是国家财政的保证支出项目，清代却有很多军队费用并无固定供支款项，不仅是临时支出，常项支出亦有。在“基金生息”项目中，不仅有军队中兵丁的保险费用、保证资金（即福利性质）之筹措，亦有武器装备、军事设施修造经费之筹措，更有练兵费、军饷之筹措，连鸦片战争前夕广东前线的备战所需亦有通过基金生息筹措的。军费之外，又如河工经费一项亦当列为清政府财政常项支出的，却亦有相当数额通过“基金生息”获得。其三，这方面的收入是持续的、稳定的。清政府虽然是举手之劳，却可免去一般风险，坐享利银，没有特殊变故，便可源源不断。当时营运生息基金的主要是流通领域中地位重要的盐商、当商，这些行业经营持续性强，与拨放生息基金为求“经久之策”、“只图寄存之久”的目的相一致。《清史稿·食货志》载：仅发交盐商之项，每年便可得“百数十万、数十万、十数万不等”的利息，并长期持续。

“基金生息”的广泛运用，导致了巨额资金进入流通过程，这势必对清代的社会经济产生影响，尤其是对主要的基金营运行业——盐商、当商来说，影响直接、明显。清政府与盐商关系甚为复杂，这里仅就与“基金生息”有关的略加叙述。总体而言，各地各级发交盐商营运之生息基金是以获得利息、筹措经费为目的的，即所谓“帑利系为备公筹款、非以资商”。很多情况下，生息基金的发放带有摊领强勉的色彩，特别到清后期，因急于筹得资金，不顾商人“承领生息银两颇多，输纳未免拮据”的困境，持续地拨放生息基金，无疑给盐商增加了额外的负担。但是，不能排除在某些时点上生息基金也有裨益于盐商的经营。乾隆年间，长芦、两淮、两广等盐区都发生过商人恳请官方不要撤去原发的生息基金，愿意继续营运交息之事，原因是他们资金不足^④。这样，生息基金就变成了赏借官帑，而且二者的利息本无甚大差别。另一方面，盐商遇到特殊情况时，官府亦曾有过减缓利息的举措，以纾商力，官府给盐商以资金、特权等支持，从中获得可观的利息和报效；商人以巨额的捐输、报效以求得官府支持和特权。所有这些利息、捐输、报效最终皆转嫁到广大劳动者和食盐消费者头上。进入晚清，由于商人承领的生息基金越来越多，同时，整个社会经济日渐凋敝，食盐产销混乱，盐商经营不善，转嫁不及，又深深陷入官帑的羁绊之中，欲摆脱不得，想营运无利，叫苦不迭，要求减低利息，如长芦在至道光末年，盐商每年要交的帑利银达30万两左右。由于种种原因，有“空赔利息”的。两广盐区大体类是。盐政请求照山东盐区先例，将在外息银减为七厘行息，对此，户部极不乐意^⑤。与此相随，各盐区普遍出现严重的拖欠帑息现象。据《清实录》记载，咸、同时期，两淮、长芦、两广、山东各盐区都欠有巨额帑息，最高的两淮达200万两以上，长芦也有100多万两。上述态势的持续，最终导致了生息基金的全面收撤。

清代的典当业十分发达。乾隆年间，京城内外共有官民大小当铺六七百座之多^⑥。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京外典当，以光绪十四年座数计之，约共七千数百余座”。在广大的贫困农村，农民的再生产甚至要靠典当来维持。“耕作之际，家中所有，靡不在质库之中”，等

到秋收之后，“以食米转换寒衣，交春又以寒衣易谷”^①，日常衣食亦与典当紧密相关。这种状况与“基金生息”亦大有干系。可以说，典当的尺量存在为清代广泛运用“基金生息”提供了有利条件——盐商之外，典当商为生息基金主要的承领营运者。大量官帑的投入，给典当业带来复杂的影响。首先，造成了典当资金的进一步膨胀，假使典当业总资金因此而超出了社会总需求，对于当商来说则是不利的。其次，由于清政府对典当取利最高限额（三分）的设定，当商营运官帑等于双方分享利息，在同一前提下，对当商也是不利的。因此，各地当商似乎对承领营运官帑并不踊跃，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湖南、湖北、广西都曾有当商以商力单薄、不能营运数额过多为辞，不欲承领生息基金的^②现象。当然，在典当商缺乏资金的情况下，拨放生息基金事实上对他们是有利的。典商营运生息基金因时因地而异，难以一概而论。

“基金生息”的运用，对社会经济也曾发生过积极的影响。如为各种类型的河防、水利筹措经费的生息基金，给防洪、灌溉等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较为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对农业生产的维持不无助益；再如一些社会救济事业——养济院、育婴堂、赈济灾荒等，由于专项生息基金的设置，使得经费有了基本的保证，最终对于社会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其它如义学、书院诸基金，对文化教育之资助亦聊胜于无。不能简单地将“基金生息”一概视为皇帝和地方官府的高利贷行为，它对清代财政经济的影响亦须进一步研究。

注释：

- ①⑤⑬⑰⑲⑳㉑㉒㉓㉔㉕ ⑥⑥ 《清盐法志》卷23，《长芦十四·征榷门》。
- ② 《大清会典事例》卷1139《八旗官兵赏恤》；卷1213《内务府·恤赏》。
- ③⑦⑧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 ② 《清盐法志》卷232《两广·征榷门·生息》
- ④ 参见《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清高宗实录》等。
- ⑥ 《清德宗实录》卷17，光绪元年九月己亥。
- ⑧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江防》；民国《湖北通志》卷42。
- ⑨ 光绪《安徽通志》卷68，《河渠志·水利》。
- ⑩ 嘉庆《大清全典事例·江防》；同治《南康府志》卷21，文征《覆勘蓼花池记》及卷6水利。
- ⑪ 同治《新繁县志》卷4《食货》；民国《大邑县志》卷2《塘堰》。
- ⑫ 《续修陕西通志稿》卷60；宣统《泾阳县志》卷4。
- ⑬ 《清高宗实录》卷757，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己亥。
- ⑭ 光绪《两广盐法志·生息》
- ⑮⑯⑰⑱ 道光《福建盐法志》卷16
- ⑲ 以上各项请参见《清宣宗实录》卷208，卷243，卷447；《清盐法志》卷23、卷232；光绪《两广盐法志》卷45、卷46；道光《福建盐法志》卷16；《两淮盐法志》卷17等，恕不一一注明。
- ⑳ 《清史稿》卷365
- ㉑㉒ 《两淮盐法志》卷17《转运12·借帑》
- ㉓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40《八旗都统·优恤》
- ㉔ 《清宣宗实录》卷118，道光七年闰五月辛亥。
- ㉕㉖㉗㉘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69《户部·蠲恤》
- ㉙ 《清高宗实录》卷855，乾隆三十五年三月乙未。
- ㉚ 《清盐法志》卷23；卷232。
- ㉛ 《清仁宗实录》卷39
- ㉜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3，《内务府·恤赏》
- ㉝ 《清德宗实录》卷305

(下转98页)

- ②⑦ 《杂文》。
 ②⑧ 《诏策》。
 ③① 《撤移》。
 ③②③④ 《情采》。
 ③③ 《体性》。
 ③⑤ 《夸饰》。
 ③⑥ 挚虞：《文章流别论》。
 ③⑦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
 ③⑧ 《通变》。
- ③⑨ 《定势》。
 ④① 《物色》。
 ④② 《总术》。
 ④③ 《附会》。
 ④④ 《周易略例·明彖》。
 ④⑤ 《人物志·九征篇》。
 ④⑦ 《辨骚》。
 ⑤① “六观”为方法而非标准，此从牟世金先生说，其《雕龙集》287页所论甚详。

（上接82页）

- ③④ 参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13《内务府·赏恤》、《两淮盐法志》卷17、《清仁宗实录》卷318、《清宣宗实录》卷353等。
- ③⑤ 转见韦庆远《档房论史文编》第24—26页
- ④①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517；卷757；卷855；卷1176；卷1406；《清仁宗实录》卷318；《清宣宗实录》卷118；卷208；卷353；卷447；《清盐法志》卷23，卷232；民国《湖北通志》卷42；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光绪《安徽通志》卷68等等。
- ④② 《两淮盐法志》卷17；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69；同治《蒲圻县志》卷2。
- ④③ 参见同治《江夏县志》、同治《南昌县志》卷3、同治《南康府志》卷6、光绪《续修嘉鱼堤志》卷3、民国《湖北通志》卷39、李朝《牧沔纪略》下，等等。
- ④④ 参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韦先生文
- ④⑤④⑥ 《清高宗实录》卷23；卷220；卷221；卷564。
- ④⑦⑧ 转引自宋秀元《从档案史料的记载看清代典当业》
- ④⑨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7辑，第457页。
- ④⑩ 《清盐法志》卷232；《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3辑。
- ④⑪ 《清高宗实录》卷582；卷1176。
- ④⑫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39；卷1213；《清高宗实录》卷757；《清盐法志》卷232《两广·征榷》。
- ④⑬ 《清仁宗实录》卷47，嘉庆四年六月谕；《清宣宗实录》卷25，道光元年十月。
- ④⑭ 诸项“基金生息”多是在“物价日昂”“人工物料倍加昂贵”等情况下运用的。参见《清盐法志》卷23；民国《金堂县志》卷3；光绪《两广盐法志》卷45。
- ④⑮ 此项生息基金之设，原因在于“满洲、汉军旗人户口繁增”、“汉军丁口较繁”。参见《清盐法志》卷24，卷232。
- ④⑯ 《淮盐法志》卷17《转运十二·借帑》；《清盐法志》卷232。
- ④⑰ 《两清高宗实录》卷311，乾隆十三年三月。
- ④⑱ 《清高宗实录》卷1176；《清盐法志》卷232。